

画家风采



丹青铸军魂 笔墨写山河

——杨幸郎的艺术人生与家国情怀

◎程琳文/供图

他是一位未曾入伍却深植军旅情怀的画家，作品被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城楼等国家殿堂珍藏；他热爱军队，尊崇军人，虽没能穿上军装，但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军营，为战士们作画；他创作的135米红色长卷，以笔墨再现中国革命史诗；他的画作作为国礼赠予联合国与巴林王国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。

他，就是一级美术师、国防大学原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杨幸郎。

从小连环画到世界殿堂

1959年，杨幸郎出生于福建漳州长泰坂里乡一个普通的农家。闽南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他的艺术天赋。少年时期，他就展现出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和过人天赋。“记得上学时，我最喜欢临摹连环画的插图，常常因为画得太入神而忘记时间。”杨幸郎回忆道，当时坂里乡交通不便，读中学的他在美术老师的启蒙下练习绘画基本技巧，用白描练习连环画。后来走出大山，先后求学于集美美术专、浙江美术学院（现中国美术学院）、中央美术学院，有缘认识很多大画家，在著名鉴定大师、《清明上河图》发现者、专家杨仁凯先生推荐下，和著名画家关山月大师结缘，在大师指导下，主攻山水、梅、花、笔耕不辍并逐渐走向成熟，并形成了自己厚重雄浑、浩瀚飘逸的艺术风格。

数十年来，他足迹遍及祖国山川，擅长山水、花鸟、写实与意象，从井冈山云海到江南春色，从黄山奇景到北国风光，自然万象皆化为笔下生机。“艺术唯有扎根生活，与时代同步，方能获得持久生命力。”杨幸郎始终将创作与家国命运相连。其作品《江山多娇》《飞泉珠玉作琴鸣》《红日照青山》《春光》《红色春天》等先后被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、中央军委一大大楼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；《花开富贵》作为国礼由巴林王国永久收藏；《国花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。2013年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代表参加联合国公共行政日活动。2018年，他更被授予“中国亚太经济合作中心



川江云起



春色



杨幸郎正在创作毛泽东诗意图

国国外事国际礼特供艺术家”“中国国外事国际礼形象大使”称号。

笔墨丹青绘就军旅情怀

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，杨幸郎的画作逐渐具备了独特的风格，并在北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等成功举办个人画展。

2001年，成名之后的杨幸郎受聘于国防大学美术书法研究院。到部队后，杨幸郎更是将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角，深深植根于基层部队和官兵之中。“我经常深入训练一线采风，在与官兵的交流中，总会有灵感迸发。犹记得第一次下连队采风时，看到战士们训练的场景，那种阳光之美深深震撼了我。”杨幸郎说。从此，军旅题材成了他创作的主旋律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多年来，杨幸郎虽未身着戎装，却以艺术投身强军事业，他为全军各大军区创作书画作品获得荣誉证书300多本。

2019年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一幅长达135米、高1.5米巨幅泼彩中国画《红色记忆高山仰止》在福建省美术馆震撼亮相。这幅杨幸郎倾注十年心血的作品，大胆突破传统取材范围，以大写意、大泼墨的手法串联南湖红船、井冈山星火、遵义曙光、延安宝塔等新中国革命历程中极富象征意蕴的重要事件或符号，艺术再现了新中国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。

其将虚与实，远与近，浓与淡，明与暗简约组合，天水无界。其笔触展示的浑厚凝重的多层次重叠积染，恰到好处地烘托了大自然的恬静与灵动，同时透过酣畅淋漓的笔墨，展示气势恢宏磅礴。“百米画卷不仅是技法的突破，更是对革命精神的致敬。”杨幸郎坦言，创作中他反复研读党史军史，甚至重走长征路，只为捕捉历史瞬间的神韵。该作品在全国巡展时引发强烈反响。

此外，其创作的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》《巍巍井冈山》等更是成为部队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。作品多次发表于解放军画报、解放军报、解放军生活杂志、解放军文艺，论文作品多次发表于《国画》刊物，并出版10余部不同风格的国画专集。其作品连续多年入选军事文化节，2022年《红色春天》获“军旅美术作品入围奖”，《解放军画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多次专题报道其艺术成就。“我的遗憾是未能从军，但能用画笔服务军队，此生无憾。”杨幸郎说。

“仙子”归处再绘故园乡情

青年时期的杨幸郎徜徉于水墨山水之间，在氤氲墨色与朦胧光雾中捕捉自然生命的律动；步入中年后，他潜心探索彩墨山水的艺术秘境，以道劲墨线与斑斓色块谱写红色史诗。始终心怀桑梓的他，最终选择以画笔反哺故土，在漳州的水仙花田里找到了艺术生命的二次绽放。

在中国，水仙花以漳州盛产品种最为著名。每年，有数百万粒水仙花球远销世界各地。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心对水仙花的喜爱，2018年他返乡漳州，并走进水仙花生产基地，晨曦中沾露的花苞，暮色里低垂的玉盏……都成为他画本上跃动的精灵。

“水仙花算是我寻找故乡记忆的寄托，画起来非常畅快，一画就是一整天。”杨幸郎向记者介绍，水仙花的独特魅力和内涵，给他丰富的灵感，让他得以构架出具有自己独特行为风韵的艺术空间。历经数月的潜心创作，《漳州水仙花》画集在2019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。其以粗犷大写的笔意将色墨交融，墨色互渗的着色泼墨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色彩饱和而不浊的清韵雅致，不但显现出了水仙花的玉立风姿和冰清玉洁的品性，更彰显了它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轻盈步微月”的风韵。其中多幅作品还在中国国家画院（国展）美术中心展出。

如今的杨幸郎还是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一名客座教授，他常常跟学生说：“艺术创作就像一场修行，需要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初心。”在他看来，艺术家的价值不仅在于创作了多少作品，更在于通过这些作品传递了怎样的精神力量。

去年，杨幸郎在全国办了4场国防教育红色主题巡回展。今年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，“只要能拿起画笔，我就会一直画下去。”杨幸郎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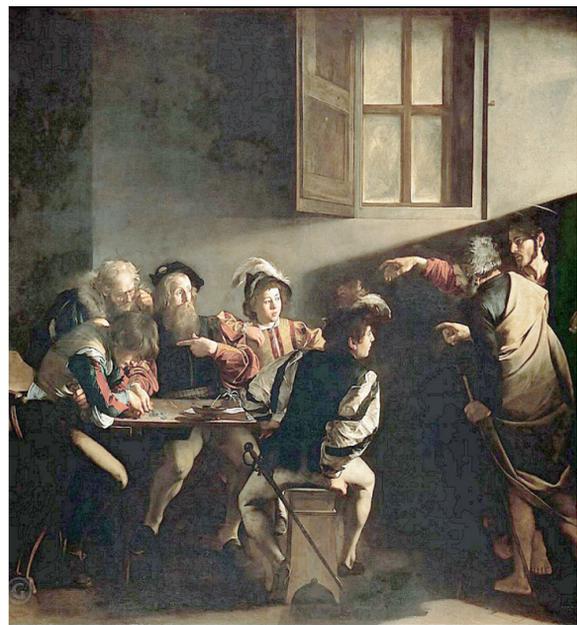


红色漳州



旭日东升

画坛观潮



圣马太蒙召(油画)

卡拉瓦乔作

17世纪初的欧洲大陆，一种全新的艺术浪潮正在突破文艺复兴构建的理性框架，这便是被后世称为“巴洛克”的艺术风格。这种充满运动感和情感张力的艺术形式，不仅重塑了欧洲的视觉文化格局，更为后世的艺术发展埋下无数可能性的种子。

发源于罗马的巴洛克风格，其名称源于葡萄牙语单词“barocco”，原意指的是“形状不规则的珍珠”，这一词源也暗示着这种艺术形式打破了古典均衡的特质。艺术史家海因里希·韦尔夫林在《文艺复兴与巴洛克》中指出：巴洛克艺术的核心在于用运动替代静止，用无限取代有限。这种美学追求在绘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家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视觉语法。他们突破文艺复兴绘画的平面构图，通过对角线布局和螺旋形结构创造空间深度，明暗对比法的成熟运用让画面产生剧场舞台般的灯光效果。人物形象常以极具动感的姿态突破画面边界。在色彩运用上，暖色调开始取代古典主义的冷峻配色，金色、深红与普鲁士蓝在画布上交相辉映，让画面充满流动的张力。

巴洛克风格的这一视觉策略在米兰的天才画家米开朗基罗·梅里西·达·卡拉瓦乔手中达到全新高度。他忠实践行着现实主义的手法，笔下的圣徒拥有市井平民的粗糙手掌和沾满尘土的赤脚，却因强烈的光影对比而显得神圣。在《圣马太蒙召》中，卡拉瓦乔精心构建了一个逼真的室内场景，在画面中采用了标志性的明暗对比手法，一束强烈的光线从耶稣的方向照射而来，指引观者注意画面内容的真正主角马太，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与视觉流动性。

卡拉瓦乔开创的“暗色调主义”彻底改变了宗教绘画的表现方式。他所开创的将神圣事件植入日常场景的大胆手法，既符合特伦特会议“艺术应通俗易懂”的要求，又赋予宗教叙事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力。艺术史家罗伯特·隆吉认为，卡拉瓦乔通过“将天堂拉回人间”的方式，实现了宗教艺术从说教到体验的本质转变。

这种颠覆性的创作理念随着卡拉瓦乔追随者的足迹传遍欧洲，在西

班牙、法国、荷兰等地催生出各具特色的巴洛克艺术支流。其中极具代表性的“继承者”之一是荷兰黄金时代的现实主义巨匠伦勃朗，他承袭了卡拉瓦乔的强烈光影对比手法，用于表现对现实世界深刻的人文关怀。

当卡拉瓦乔在意大利掀起现实主义革命的彼得·保罗·鲁本斯正在创造另一种巴洛克艺术典型。这位精通七国语言的精英画家，将威尼斯画派的色彩传统与北欧艺术的精细刻画完美融合。鲁本斯在《法厄同的坠落》中充分展现了巴洛克绘画的典型特征：法厄同从无法控制太阳车从空中坠落，身后天空、云彩与落日余晖共同流转，人与马的动态表现出了旋转的、混乱的极致动感，利用强烈的明暗对比，使观者能够切身体会到场面的悲剧性和紧迫感。

比较两位巴洛克大师的艺术语言，卡拉瓦乔通过光影强调瞬间的戏剧性冲突，鲁本斯则擅长用流动的笔触和色彩营造神话场面的恢宏气势。前者画中的光如利剑刺破黑暗，后者笔下的光则如丝绸般包裹形体。这种差异也体现出巴洛克艺术的复杂内核，使巴洛克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国际艺术风格”。

巴洛克绘画的影响并非局限于自己的时代。后世的艺术家保持了对巴洛克光影与画面张力的继承。艺术史家肯尼斯·拉克曾断言：“整个现代艺术都是与巴洛克传统的持续对话。”这种跨越时空的影响力，源自巴洛克艺术对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把握——既赞美现世生活和人物情感的丰饶，又敬畏神话故事的伟力。

当我们重新审视巴洛克时代的画布，看到的不仅是技巧的革新，更是人类认知方式的转变。那些旋转的云层、飞舞的衣褶、瞬息万变的光影，共同构成一个处于永恒运动中的世界图景。在这个视觉体系里，神圣与世俗的界限被重新划定，情感体验获得了与理性认知同等的地位。或许正是这种对生命复杂性的诚实呈现，使得巴洛克艺术历经四个世纪依然充满生命力，持续给予当代创作者启示与灵感。

巴洛克——光影交织中的运动与激情

◎陈紫诺 文供图



法厄同的坠落(油画)

鲁本斯作